

# 地 理 学 的 未 来\*

R. J. 约翰斯顿

地理学是对地球的描述。作为一门科学,它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反映了十九世纪获取有关地球表层上极其多样的环境、人民和地方的信息的兴趣。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商业冒险的需要服务,但在更大的程度上仅仅是为了满足受过教育的富有阶级的好奇心。现在,这种好奇心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它(尤其在人文地理学中)已被一种对假想的普遍规律的关注所取代,这些规律是人对环境、空间、地方和人民的反应,却忽视了自然与人文背景的多样性,而正是这种多样性构成了地球表层压倒一切的特征。地理学者中这种取向的转移是目光短浅的,也是有害的。紧迫地需要重新激起对于地球表层上所有部分的地理好奇心,这并非出于片面的窥视癖理由,而是因为,如果没有一门重大的教育性和学术性学科来揭开它为之服务的社会的面罩,那么对世界的认识甚而至于世界和平都将比现在更为危急。

**离 题** 地理学者,特别要指出不仅是人文地理学者,在最近几十年里已经变得心胸狭窄而又目光短浅。他们的眼睛对天涯海角已于不顾,他们的注意力只是集中于自己的国家和地区。当然,这种说法只是针对英国和北美的地理学者,也可以针对其它国家(但西德看来不属此列)那些在语言、文化背景、学术联系及哲学基础上与我有共同之处的地理学者。

英国和北美的地理学已持续好几十年脱离了与大部分世界的密切联系。外国区域研究正在经历从“繁荣”到“萧条”的转变。例如,英国地理学家协会有18个研究小组,其中无一关注地球表层的任何特定区域。同样,美国地理学家联合会有35个专门小组,其中只有5个关注地球表层的特定部分(非洲、亚洲、加拿大、拉丁美洲、苏联与东欧);全部专门组的成员有5619个,而那5个专门组只占420个。最近对该协会成员作了一次“区域精通”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其5174个成员中有3000个左右对国外有兴趣。

以上提供的材料似乎有点矛盾。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虽然很多地理学者都有对海外国家的教学兴趣——尤其是在北美万金油式的大学程度背景下——而研究兴趣却要少得多。分析一下发表的文章就更清楚了。最近对美国三家主要杂志(《美国地理学家联合会年刊》、《经济地理学》和《地理评论》)的分析显示,1960—1964年论述外国区域(不包括加拿大)的文章占49%,而在1978—1982年只占24%;1980—1983年的美国地理学家联合会年会上,只有13%的论文论及外国区域。由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美国地理学者们对他们的工作有一种“危险的狭隘关注”,他们相信地理学应探索各种与特定地方无关的模式。关于英国地理学者,这种百分比看来一直是很低的。对《英国地理学家协会会报》的分析显示,在1963—1965年间,所发表的论文中有26%关注于非英国的地区;十年后(1973—1975)这个比例是18%,而最近期间(1981—1983)为17%。法默(Farmer, 1983)把英国海外研究倾向的衰落大部分归咎于经费不足和缺乏机会,但这仅仅是部分原因。显然,正如法默本人所认识到的那样,这种衰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在理论和实践中鼓励普遍性,区域所显示的特殊性在这里是毫无用处的”。

---

\* 本文题目原是“走遍天涯海角”(To the ends of the earth),是《The Future of Geography》一书的结论部分,译者认为用现在这个题目更为合适。

最后, 追随着研究兴趣, 教学计划尤其是大学的教学计划也表现出明显脱离外面的世界。三十年前, 大多数英国大学地理系都提供广泛的区域课程, 它们涉及世界的很多地方乃至全部; 在某些系里, 区域课程是必修的, 尤其是在大学课程的最后一年。那时认为区域研究综合了各种系统研究, 并赋予地理学在科学中的特殊作用。可是现在的区域课程已很少了, 而必修的区域课程——尤其是研究外国区域的课程——更是几近于无。

地理学者脱离天涯海角, 造成目光短浅, 这可能导致排外症的发展。地理学以其学科历史之光辉, 在教育人民成为世界公民方面一直起着某种先锋作用, 并揭示了环境状况的多样性。但学术上的脱离已经伴随着教育上的脱离, 尤其是在至关重要的中学和大学水平上。地理学不再扮演其传统角色了, 大学、专科学院也不再培养长于外国事物之解译的毕业生了, 中学教育的性质也因此变化了。更有甚者, 由于学术训练对学校课程的支配力量, 教学大纲也被改写, 这就使地理短视得以制度化。学校的地理教育再也不为世界社会的生活提供知识基础, 相反, 它认为世界是少数几条简单地理规律的一连串实例, 每一个人都象我们一样。

我们为什么会离题? 当远游的能力已显著扩展, 当世界已迅速地组合为大经济集团和政治集团, 当对世界和平和生存的威胁空前高涨, 这时却发生了这种向我们狭隘本土的撤退, 这岂不荒谬。那么, 我们为什么会离题呢? 我们用什么来取代我们的传统关注呢?

近几十年中对区域地理学的衰落已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些人归诸于那一标题下所作实践的贫困, 另一些人则归诸于系统研究的吸引力, 一些国家对海外研究的财政、后勤支持已大为减少(虽然现在跨大西洋的相互作用空前繁荣), 而地理学重点已发生了某种重大转移。

当代(即1960年以后)人文地理学以系统研究为特色, 很少有人以构成一个特定地区或国家之地理的各种要素的详细知识为业。他们的大多数工作都继承着传统(即1920—1960年间)区域地理学的经验主义传统, 其重点在于观察。但是那种区域地理学是例外论的, 强调每个地方的独特性; 而当代地理学却是实证论的, 这后一种哲学强调普遍性。在人文地理学中, 认为行为服从因果关系普遍规律的作用, 而这些规律的性质可以通过与经验证据相对照的假设检验过程来鉴别。在这种背景下, 人文地理学者们就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空间行为和空间分布的规律上。

这种对规律的实证主义关注加强了目前绝大多数地理研究的基础。甚至在这种关注并不明确的场合, 也常常把特定情况的描述解释为可推断过程的案例研究, 并用作概括其它地方乃至全世界的基础。在那些看来非常向往能把人类行为囊括在几个方程之中的模型的社团里, 这种实证主义方法非常显著。

实证主义模型是从自然科学中引入人文地理学的。它含有强烈的普遍性原理: 在一个地方观察到的行为被设想为所有行为的范型。虽然这作为研究自然和生物(非人文)科学的基础完全无可非议; 但它对于研究以文化和历史之深奥以及智慧生灵之决策为特色的人类社会是否贴切, 却是大可置疑的。然而它却充斥于学科文献, 特别是作为大、中学教育基础的教科书中。系统人文地理学教本是围绕着与空间行为和空间组织有关的普遍性论题建立起来的, 而用以说明这些论题的“有关”实例来自何处则完全无关紧要。很多作者一直认为英国的情况与北美的情况并无不同, 以至多年来城市地理学的文献总是假设: 适用于芝加哥、塞达拉皮兹和多伦多者也必定适用于其它任何城市, 北美城市地理学的课本中居然包括了英国的实例! 如果也能找到非洲或亚洲的实例来说明普遍性论题, 也总是照引不误。

自然科学的教科书都明确地指出了普遍性原理。正如库恩(Kuhn, 1970)所阐述的那样, 这些教科书“解释已接受理论的主体, 说明其很多或全部的成功应用, 并将这些应用与典型

观测和典型实验加以比较”。换言之，这些教科书限定研究领域，总结出什么东西已知（什么疑问已经解决），什么疑问还有待解决，释疑过程是如何进行的。如上所述，在人文地理学中，这种总结通常意味着我们的知识和方法都具有普遍性。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接受了实证主义哲学；也由于受到唯利是图的出版商的鼓励，出版商要求尽可能大的市场，因而鼓励作者写作适用于一切地方的书。但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些书却什么地方都不适用。

这种普遍性假设近年来已日益受到持各种哲学见解的地理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这种方法没有道理。他们希望促进的是另一种学科，它承认并重视人类对环境、空间、地方和人民的反应的多样性，它把世界表达为不同地方的一种复杂镶嵌而不是某些普遍性行为模式的一系列实例。但他们还是少数派，实证主义方法仍然支配着研究文献和教科书。

**离题、不成熟和不祥之兆** 实证主义模式的重要性为何每况愈下乃至受到颠覆呢？赋予新一代地理学者以全新的奋斗目标以便施展他们的专业抱负，这样做合适吗？亦或这不仅仅是学术争论？我的观点是：如果不重新回归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那么地理学者们对这个世界的最终崩溃是要负责任的。

这个论点以如下信念为根据：实证主义人文地理学中的普遍性原理所增进的并不是知识，也不是信息，而是无知，尤其是对人们国土界线之外世界的无知。作为这种方法之核心的空间行为和空间组织模型都假设每个人都象我们一样，或应该象我们一样；如果他们不象我们一样，那他们就是反常，因而应受“教育”以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对于构成世界地理的文化和其它镶嵌物的多样性，我们不是从意识上消除了，就是把它篡改了，产生一种“他们和我们”的“纯化”印象，这就使形势两极分化并激化了冲突。

在里查德·申勒特的《无序的作用》一书(Sennett, 1980)中，这种“纯化过程”是其分析城市冲突之原因的核心。各种个人和社团都领悟到需要同一性，需要一种自我形象。在创造这种自我形象时，也创造了“他人形象”，这就强调了“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不同。这已成为一种重视组内共同性和组间差异性的刻板化和标签化过程；一个人要由他或她在某一特定的刻板组织中的成员资格，而不是由他或她本人的特征来鉴定。

申勒特把这种刻板化过程与青春期和个体的不成熟联系起来。他认为青春一般都以“彷徨和探索”为特色，但同时也包含着“逃避未知棘手经验的策略，从而导致要求纯洁和一致的愿望”。我们企图把一种一成不变的秩序强加于我们的生活，限制我们个人的自由（并通过我们团体和社会的认可也限制我们同伴的自由）以避免“生活中未知的因而也是具有潜在危险性的经历”。此外，为了创造自己纯洁又一致的特性，我们就把自己与他人疏远开来，从而为冲突创造了条件。这些都是以无知和成见为基础的。

申勒特应用这种青春期纯化同一性的模式来分析城市社区中的冲突问题，特别涉及到美国1968年夏季的种族骚乱。他认为，社区中的各团体都通过疏远过程（尤其是城市居住区格局的创造过程）来避免与其它团体接触的潜在不愉快经历，因而也逃避接触未知事物，代之以常常是既消极又错误的印象。这样，人们就共同行动起来创造一种公认的纯化同一性，以防避经历其它同一性时有可能产生的混乱。

“人们描绘出一幅他们自身的图画，把他们全体捆绑成具有一套限定的好恶和目标的一个人的……经验的框架崩溃了，为了创造一种一致的集体同一性，社会生活中全部形形色色的经验都被缩合为一”。这种同化理想的结果是：纯化团体之外的参与没有了；各种差异之间的对抗也消失了。由于拒绝任何交往或由于固执其一致，各种异常的事也被抑制了；而可能逐步升级为暴力行为的冲突也助长起来。

“由于其共同之处而使其内的人们感到相互关联的那些团体实质上也是两极分化的。当问题在团体之内或之外产生而又不能按常规过程解决时……他们就感到团体的存在处于危急之中……团体中的人们只是为了避免恼人的经验，无序的对抗就产生了他们是一致的感觉……对他们自己生活中的无序如此缺乏忍耐力，自我封闭又使他们对无序如此缺乏经验。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张力的爆发就势所必然，侵略、暴力和报复这样一些极端手段似乎不仅是正当的，也是维护生存所必需的”。

申勒特的论述涉及城市中社团的两极分化，涉及在如此分离的地域结构内创造的纯化同一性，涉及对其它社团成员的成见和对“他人”消极方面的挑剔，还涉及在各社团进入接触和冲突时所产生的反作用力。疏远助长居住区的分离，分离又加剧黑人与白人间的相互恐惧，美国城市社会中财富分配的不公平使这两个集团发生冲突和暴力，最后导致60年代美国城市的种族骚乱。按照申勒特的意见，解决的办法是消除纯化的同一性，并由此促进接触和和解。其途径是创造出不是以纯化的社团而是以无政府式的无序为特征的城市。“具有多样化集团的生活经验自有其机能。由于人们每天都看见如此众多的形形色色的人，敌人的形象也就不清楚了”。

申勒特的分析可应用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虽然其解决办法还不能照搬。民族国家的产生就曾经是一种制造纯化同一性、助长“我们”的感觉并强调我们与“他们”之区别的一种尝试。“他们”被看成是威胁，是一种共同的危险，我们必须防御他们。近几十年来这一点已不象东西方关系的“冷战”时期那样明显了，那时铁幕两边的每一个大集团都把对方描绘成敌人，描绘成对民族同一性和国家安全的威胁。这种局面在各种地区规模上都会发生。世界人文地理就是相 不信任甚至相互敌对的若干国家和地区的拼盘。但加剧这种对抗会导致暴力行为，暴力行为持续下去则是两败俱伤。

这里不讨论申勒特对城市尺度上此类问题的无政府式解决办法。需要有另外的机制来打破纯化同一性，来消除不信任和恐惧并代之以和解和相互尊重。为此，我们需要信息 and 理解，我们必须懂得人类的多样性，接受它并与它共存，而不要企图以抹煞所有的差别来作为一种消除潜在威胁的手段。

在国际尺度上，寻求调解对抗时也会有类似过程——有时是通过公开的“穿梭外交”进行的。但是在问题已经产生时才试图解决问题并不能防止问题发生。如果能打破目前的这种愚昧障碍并使各社团（国家的、区域的和地方的）更加互相了解，那么问题的防止是可能的。对于这个根本的社会任务，人文地理学可以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必须增进知识、理解和信任，为了生存于世，我们必须自觉地呈现出世界的全部多样性。地理学是一门达到国际了解和世界和平的主要教育途径。

怎么办？ 地理学存在的理由在于增进对构成当代世界之文化多样性的鉴赏，在于揭示这些文化作为对环境、空间、地方和人民的特定反应在每一社会中是如何演化过来又将如何演化下去。所有教育层次上的学生都不应被剥夺经验（虽然常常是第二手）这个世界大拼盘之丰富性的权利，也不能给他们留下这样的印象：“我们”总是正确的，某些人跟我们一样因而也是正确的；而另一些人则有不同的行为，这是错误的，应该改正他们的错误。为了增进这种活生生的知识，应当鼓励研究人员去探索地球的多样性并予正确评价，而不是把这种多样性约减成克里斯泰勒和冯·杜伦的当代实例。

这并非主张地理学成为旅行见闻录，更不是要倒退为倍受指责的“岬湾地理学”及其继承者“传统区域地理学”。最近的文章中已有这种倒退的主张，这些文章虽然有合理的动机，

但并没有为复兴区域地理学提供明确的观点，所主张的只不过是回复到例外论传统。例外论是地理哲学连续统的一个极端，而实证主义则是另一极端。后者主张一切事物都有普遍性，而前者主张任何事物都无普遍性。通常需要持一种中间立场。

这种中间立场必须以一种既增进理解又不会误入某些陷阱的方式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那些陷阱中为首的一个是独特性陷阱。按照这种观点，每一个区域——有其环境、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特征的集合——都被表达为一种独特现象，只有如此才能认识它。拿其它地方来作类比是不合适的，不存在到处适用的普遍规律。因此每个区域都有其自己的专家而不需要多面手。与此相对立的是普遍性陷阱，它把每一个区域的特征都表达为几条普遍规律的某种特定组合结果。其它地方则不会表现出同样的规律组合，但通过首先鉴定普遍规律然后鉴定规律的特定组合如何形成（后者本身可能又是“较高层次规律”的结果），就能够获得对每一个地方的认识。

要避免这两种陷阱，就要把每一个地方和区域看成是特殊的<sup>①</sup>，看作是对普遍性过程的个别反应的产物。这种反应由个别或集体起作用的若干自由动因造成。它们反应的过程是普遍的，但对它们的解译却是个别的。这种反应不会进入无准备的过程。整个社会化过程提供了一个背景，在这个背景下各种过程都可以解译，明显的反应都可以鉴定；反应本身又将成为将来社会化背景的一部分，为各成员行动于其中的局部社会增加基础。

在当代世界，大多数地区的普遍性过程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转相联系。这为个人和社会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个唯物主义基础，它由聚积财富（通过售出货物和服务获得利润）的需要所驱动，并建立在（少数）财富聚积者与（多数）劳动力出卖者之间的冲突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运行就是围绕着这种规则及其基本人口阶级分化建立起来的。

虽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某些解释掉进了普遍性陷阱，但它并不是一种决定论机制。代理人对其规则作了多种多样的解释，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方面——即作为国家、地区和地方特征的个别社会构成方面——提出了众多变种。这些解释都铭刻在社会的记忆里，作为其文化的一部分，并提供一个使未来的决策在其中社会化的背景。这些解释也被当作企望，形成一个既限制社会构成的演化又使决策得以作出的关联域。

作为地理学者，我们的目的是要促进对这些社会构成按其全部多样性作出的正确评价。但我们决不能落入独特性陷阱，决不能专注于我们所选定社会的特殊性而不去鉴别它们与普遍过程的关系。因此，我们的工作必须包含两个主要因素：（1）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其它有关生产方式）普遍过程的理论鉴定；（2）对特定社会构成的经验鉴定。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增进对世界的认识；没有前者我们就掉进了独特性陷阱，而没有后者我们则会被诱入普遍性陷阱。对背景的鉴定是至关重要的。社会构成都有其历史和文化，如果要认识当代社会，就必须全面地鉴定其历史和文化。

并非所有的社会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其中有很多是建立在前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对这些生产方式也必须加以认识。例如，在很多情况里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初始背景都是由前资本主义社会构成所提供的，而这个背景已向当代社会构成及其前景迈进。今天，有一些社会企图挣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在其特征上也是一地不同一地的，对其规则的解释反映出不同的地方特点，各种解释都受当地的前社会主义背景制约，

<sup>①</sup> 这里的“特殊”(unique)与前文出现的“独特”(singular)是有区别的，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有如下解释：“独特现象是不能用任何普遍原理来说明的，而特殊现象则由若干普遍原理的特定相互作用所引起，因而可以通过认识这些普遍原理并认识它们如何在那一特定场合中结合起来而加以说明”。——译注

# 雨水——发达与发展中国家 均可选择的水资源

D. H. Waller

**引言** 雨水贮存系统是直接收集房顶或其他地表的雨水并将其输送到某种贮存器中备用。

雨水贮存系统，无论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可见到。在无其他水源的地区和在可用的地下或地表水源受到天然或人为污染的地区，使用雨水贮存系统的形式不同。

在世界大多数地区，雨水系统可供每个住宅使用。雨水可从房顶或地面集水处收集起来。可以贮藏在低于房顶的水箱中，或地面上的坛子、贮水池和水塘里，也可收集在埋入地下的水箱中。伊朗和百慕大使用大型集水器和先进蓄水池的公共集水系统，这种系统也曾用于美  
~~~~~  
也为该社会与其它社会的联系所决定。

为了促进这里所主张的此类社会认识，地理学者们在其方法上必须能够兼收并蓄，吸收多学科的营养来促进自己。他们的理论鉴定需要密切注意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他们的经验鉴定要求仔细研究所要分析之社会的历史、文化和体制。他们的兴趣可能使他们专注于个别的行为，但一定要把这些行为置于某种关联域内，而且要避免独特性陷阱。或者他们会企图对很多个体的聚集行为加以普遍化，那么统计方法对此是理想的描述手段；但决不能把此类描述解释成规律以致导致普遍性陷阱。为了鉴赏特殊性，可能会需要多种多样的方法论，作为方法论它们总是受欢迎的。但是，所要避免的是与那些方法论常常错误地联系在一起的哲学，例如与数量化联系在一起的实证主义和与个别研究联系在一起的理念主义。

**结论** 在某些场合无知可能是福气。在目前世界和平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无知却是危险的，它导致基于错误成见的糟糕决策。由于决策人将别人的情况过分简单化，形势常常会弄得更糟。这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是一种不愿面对并适应世界复杂性的表现。不能适应就常常发生冲突，而冲突的结果又常常是一方灭亡，下一次冲突则很可能导致全体灭亡。

为了促进适应，我们必须增进理解，我们必须正确评价其它地方人们的所想所为。为此我们需要地理学，但不是实证主义传统的那种枯燥无味的、没有地区的地理学，也不是例外论传统（包括其近来的理念主义继承者）的那种窥视癖的、没有结构的地理学，更不是那种排斥个人行动自由的机械论地理学。我们需要一种地域地理学，它建立在一定的关联域基础上，它将决策者置于其历史上产生的文化环境（包括对自然环境的态度）中，置于其生产方式的规则中。这必然是我们教学的基础，因为若没有这个基础所能产生的理解，我们社会的未来是很危险的。

有多少代地理学者曾经被吸引到天涯海角去，我们这一代却使自己摆脱了这种诱惑力。地理学若要成为一门恰当的学科就必须扭转这种变化。我们必须教育世人懂得世界，消除短视，反对排外，并通过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来促进和平。世界是属于我们的，但如果我们不能推进对它的彻底研究，它就可能谁也不属于。

蔡运龙译自《The Future of Geography》，Methuen, London and New York, 1985, 第17章